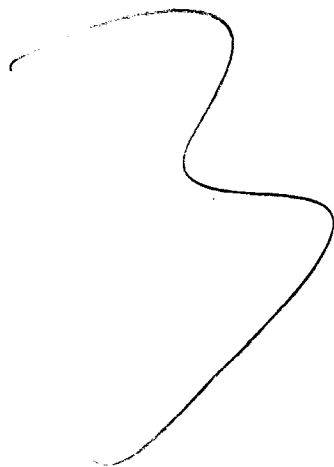


散文

2007 精选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I267/685

2008

散文

2007 精选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散文》2007 年精选集 / 《散文》编辑部编.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8.1

ISBN 978-7-5306-4873-5

I. 散… II. 散…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93509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新华二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20.5 插页 2 字数 312 千字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定价: 35.00 元

写在前面

汪惠中

【一】

散文若有好的将来,我常把它想像成一种植物的样子。一个像野草一样的植物。

野草,这是我对文学图景的最高想像;自然是它唯一的滋养人;野草的家园的秩序,不是垄沟和田畦,而是自然法则。

地面的部分枯萎了,野草,它在地下还有着根。

【二】

野草在被驱赶。

不能为新的生活添砖加瓦,野草正在变得没有用处。生活中的植物气息越来越淡。植物当中,水稻能被人们授受——水稻生长在“田”字符号当中,在收获的季节,水稻站成军队方整的模样——水稻是人的成果,它有着可以被估算的交换价值。

野草在我们的价值体系之外,它是自然的成果。

【三】

野草之野,在于独特本性,出落天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写作者不是哪个人、哪群人“培养”出来的。老师、领导也好,编辑也罢,他们曾经帮助过写作者,尽管这一过程闪烁着美德之光,但我们却不能以“培养”来概纳之。种种帮助,仅是为写作者提供了与世界发生联系的契机。手把手地教,无疑是浪漫的,但写作者的出路,总是个人分头去找。

【四】

野草之野,不是去做隐士。

我们有隐逸的传统。我不排除其中真有高人。但须知,我们的隐逸传统是所谓“入世”思想的伴生品。若干隐逸事件被后人美化、误读,意义的能指在不断的扩充。事实上,多数隐逸事件的核心所指被挖掘出来,我们就会发现,在丰富的能指性所构成的圆周里,圆心处站着一个奴性十足的人,一个心胸狭窄的人,一个被专制系统抛弃而灰头土脸的人,一个貌似隐逸实则窥探心尚存的人。

野草之野,持本性而已。

野草的出路在哪里?绝非“有朝一日”变紫檀。野草的出路,在于长成它自己。

【五】

既是野草,其盛衰自是命系于天。天若纵之,野草必得四时之养,其盛势蓬勃;反之,四时之养断、地不利其生,休问缘何摧枯,天欲灭之矣。故野草不必追求GDP,写作者也不必非得当劳模。

但人是极难拒绝悬赏的。在写作者面前,市场主义的文学生产正在高悬着赏金。我不想抹杀市场里一些“成功”作品的魅力,但它们的“典范”作用却对写作和批评起着相当的误导。市场主义的一些金科玉律,正在扩大它的统辖区域——它们在侵占文学的地盘。我对商业写作并不抱敌视态度,人们的智力活动需要挑战“聪明”的极限;但这种“聪明”不应该随处蔓延。

“聪明”的修辞学是可以接受的,“聪明”的文学观则不可取。写作者必须有因文学而来的矜持与孤独。写作者,你当代表人类珍惜与文学的缘分,与野草的缘分。

【六】

日前,给一个优秀的写作者新著上题几句话,我借此这样表达了我之所谓好的文学:用“活泼”来说明好的文学是不恰当的,除非“活泼”摆脱了某种庸俗文学观而获得了野草的性质;用“真实”来说明好的文学也是不恰当的,除非“真实”摆脱了本质主义认识论而获得了真理的性质;甚至用“体验”来说明好的文学亦尚存欠缺,除非这“体验”中暗藏着高贵的逻辑力量。

目录

【卷壹】

万方 透明的生命	003
徐鲁 无尽的猜想	011
赵广建 回忆赵树理	016
张艳茜 有关路遥的记忆两题	025
藏策 大哉,梁斌	030
马力 因他,我呼吸着五四的文化空气	035
苏北 温暖而无边无际的包围	041
段华 记忆的流云升起来	047
杨捷 走着,或者停下	053

【卷贰】

- 061 李汉荣 | 凝视：母亲用过的……
- 067 李林荣 | 失重的年岁
- 070 陈启文 | 谁正与你擦肩而过
- 076 周玉波 | 旧人事
- 081 王陆 | 母亲
- 087 郭庆军 | 凄凉的人生
- 093 陈炳熙 | 漂亮的女老师
- 099 张俊纶 | 亲人三题
- 106 王萱 | 因为父亲
- 112 彭荆风 | 昆明往事

王陆 要塞	119
张利文 药与罪	126
徐成森 中国:1956	132
许俊文 乡村散板	138
夏磊 匡庐晚钟	148
刘塬 荒岛	155
马步升 黎明时的错误	161
洪烛 寻找成吉思汗	165
谷禾 看不见的城市	169
朱以撒 悄然浸润	180
许俊文 一些东西隐藏着	186
东邪 残堡【外一篇】	191
朱苓 香提尼克坦	195
王月鹏 鲁山,在鲁之山	200
李新军 欲望的鸟道	205
王月鹏 齐国故地	208

【卷叁】

【卷肆】

钱红莉 昆曲流水	217
聂尔 拜见曹薰铉	222
张宗子 怀梦草	225
姚克明 四马路的文学时代	230
王晓莉 人间食粮【外一篇】	235
小飞 杂谈马氏相声	240
阿贝尔 九寨沟	245
荆歌 江南三忆	251
杨荻 七月照相馆	258
闫红 只因她贪恋泥淖里的温暖	261
方如果 谁在大塘里唱歌	264

【卷伍】

271	江少宾 消失
278	王多 海帆的世界
283	尚新娇 乡村二题
287	勇康 南风【外一篇】
291	王小忠 怀旧【外二篇】
295	阎纲 人生之悟
298	吴梦川 失落的帝国
308	崔东汇 天堂的距离
313	言子 那一只渡江的舟
318	李亮 一朵花,两朵花,三朵花

卷壹

長
念
之

长念之

这如斯的逝者，这机缘的混合体。

这如斯的逝者，这美与真理的暗示者。

万方 透明的生命

已经过去十多年了,1996年12月的那个冬夜,电话铃声响得那么突兀,把我惊醒。四下里一团漆黑,我拿起话筒,听到小白的声音,他一直在医院里照顾我爸爸,他说:曹老情况不大好,医生让你到医院来。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多问,把电话放下。那时我看见床头的小钟指着四点十分。我走出家门,苍黄的路灯下大街空空荡荡,没有一个人影。我走到街中心,等到一辆出租车,汽车在黎明前的城市飞驰,冥冥中我的心有所期待,期待什么都没有发生,一切回复到正常。然而在这巨大虚空的黑夜后面,我感到了正在发生的事情,我的爸爸走了。

他走得很安静。当时的情况是护士半夜查房,给他量了血压,他还在睡着。十多分钟后护士长又进来看看,发现他的呼吸不对,极慢极浅了。做了病理检查之后,也没能查出明确的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致死的原因。想来他很有福气,没有经受垂死的病痛折磨和死亡的恐惧。在寂静的深夜,他衰弱的身体里产生了难以觉察的奇异的波动,也许有个声音告诉他“我们要走了”。他来不及多想,甚至没有听清楚,他想问问对方,可是又没有力气。在最后的时刻,是他对一切事物的好奇心引导他跟着那声音去了,他没有见过死神,他想见一见。

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陪我爸爸去了一趟天津。那一次的旅行使我很贴近地感受到他的童年,了解到他这个人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他所以是他。我们来到意租界,他认出了旧时的街道,兴奋极了,连连说:“不错,绝对不会错的,这一家姓萧,那一家姓陈,我真是像在做梦啊!”他的家“小白楼”是座两层的小楼,门前搭着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里面住了好几家人,但都上班去了,只有两个老人在。我爸爸只顾往里面冲,甚至顾不得和主人打招呼,这在他是很少有的。

他回忆起许多往事,教他书的大方先生,也教过袁世凯的儿子,好玩古钱,有好几个姨太太。他记得客人在楼下的小客厅等着他父亲下来,他父亲摆着架子,等客人行三拜九叩礼,然后父亲就和客人对着抽鸦片烟。“那时候真是乌烟瘴气哟!”他说,“哥哥在楼下抽,父亲母亲在楼上大客厅里抽。每天我放学回家,他们抽了一夜的大烟还在睡觉,家里像坟墓一样。”他还记得胡同口逃难的农民,一头挑着锅,一头挑着孩子,晚上叫得很惨。听他的话使我感悟到,出生在旧中国的文人,他们大多从小就感到压抑,继而觉悟到有一股与他们格格不入的势力的存在,从此他们的生存就处于个人与一种势力对峙的状态。这成为他们无法逃脱的命运,他们也不想逃脱,他们从来无缘体味“为艺术而艺术”的闲情逸致,这才是他们的情结。我无法说出这种势力的名称。在我之前,在不同的时代,它以不同的面目存在了上千年,使个体的生命消失,变成一种适合于它的形式。无数中国人的生活被改变,而那些不甘于被改变、有独立意识的人,就要有所作为。我爸爸写剧本就是他的作为。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才华更是上天给的。我爸爸有幸被赋予了才华,他的成名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像几乎所有当代的中国文人一样,在二十几岁就迸射出创造的光辉。我体会他真正的才华,在于他全身心地活在自己独特的感觉之中,登上了自己的那块石头。他迎接命运,他愤愤不平,他痛苦,他要反抗,一股股激流从他身边汹涌而过,他的心被激荡,也许他也想化为激流,或者说把自己投身进一股强大的力量里,可在他的心灵中有一个小人儿,具有把握他的更大的力量。就由于有他的把握,他写出《雷雨》。

那时他在南开中学念书,他和我说过,他有一个同学叫杨善全,和他关系不错,他和杨善全说,我有一个故事想写出来。同学就说,那你讲讲吧。他说:“我讲了,讲得乱七八糟,他也没听出所以然,只说,很复杂呀,你写吧。”我还听到他和来采访的人说,“你们要我讲繁漪是从哪儿来的,有什么原型?有,肯定是有,好多好多。但我要说出张家老太太,李家少奶奶,王家小姐,有什么用?讲了也是白讲,你们也不认识。《雷雨》这个名字,如果硬要我讲,雷,是轰轰烈烈的巨大声音,惊醒他们;雨,是天上而来的洪水,把大地洗刷干净。”

我和爸爸一起去过他的母校清华大学,在图书馆,他指给我看当年写《雷雨》时常坐的位子,说:“当年图书馆的一个工作人员,他待我太好了,提供我许多书籍,原谅我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他还允许我闭馆之后还待在这里写作。那些日子

真叫人难忘啊！不知废了多少稿子，都塞在床铺下边，写累了，就跑到外面，躺在草地上看悠悠白云，湛蓝的天。当时我就是想写出来，从来没有想到过发表，也没有想过演出。”

后来，抗战时期在重庆，我爸爸写出了《北京人》。当时有人对《北京人》在那个时期出来有所非议，似乎认为不合时宜。我不这样看，恰恰相反，我认为他站在自己的高度，看到那个高度所看到的世界和人。我时常想，要具有对人生多么深切的感悟力，体味埋得多么深的痛苦，才能写出《北京人》来，而我爸爸那时还是个青年。我一直觉得《北京人》里每个男人身上都有他的影子，他比他们加在一起还要丰富生动。

由此我想到自己的幸运，一个有才华有灵魂的人活在我身边，我得以看着他生命的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如同看着众多的中国文化人，甚至是中国的知识界。当然我不能把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等同于另外一个，但他们的命运确有共同之处。长时间以来，我爸爸和许多的人，他们都被告知他们的思想是需要改造的，这种对灵魂的改造像是脑页切除术，有时是极端的粗暴行动，还有就像输液，把一种恐惧的药液输入身体里，让他感到自身的渺小卑微，这是非常严酷的。曾经我写过一个话剧《谁在敲门》，就是出于我所处的独特的位置与切身的感受。我试图写一个充满创造力的人，创造出了不起的作品，后来创造力消失了，但奇怪的是一顶闪光的帽子始终戴在他头上。在文化大革命中，这顶帽子被掀下来，连同他的脑袋一起扔进了屎坑。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帽子和头再次被安放在他的身体上。这是一种极端反常然而曾经确实存在的现实，戴着耀眼的“桂冠”，而随时可能连脑袋一起被摘除。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爸爸被打倒，被揪斗。我家住的中央戏剧学院宿舍的大门上写着“打倒反动权威、反革命文人曹禺”的大标语。有一段时间，我爸爸被关在剧院里不能回家，他们这些黑帮分子到马路上扫大街，小孩子用石头砸他们。我爸爸回忆说：“那时候我羡慕街道上随意路过的人，一字不识的人，没有一点文化的人，他们真幸福，他们仍然能过着人的生活，没有被辱骂，被抄家，被夺去一切做人应有的自由和权利。”

后来我记得放他回家了，他把自己关在屋里，能不出门就不出门。人民大学那时就在我家隔壁，每天从早到晚造反派都在高音喇叭里大叫大喊。我爸爸在一篇

回忆中写道：“酷热的夏天，方瑞和小欢子（就是我妈妈和我妹妹），她们沉沉地睡在另一间小屋里。白发的岳母瘫在木板床上，一夜一夜地咳嗽。半夜，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一阵阵粗野的声音，那鬼哭狼嚎使我的胸口隐隐作痛。我觉得不久这群发疯的黑狼将包围我，抓着我，用黑爪子抓伤我的脸、我的背，我感觉自己已缩成一团……这大约是梦，我惊醒了。我勉强安慰自己，用一颗安眠药只睡了两三小时。”再之后他被剧院的革命群众“解放”，在郊区的农场劳动。每个礼拜六，黄昏时分，我从窗子里看见他的身影出现在大门口，推着自行车跨过门槛，然后又骗腿儿骑上车，至今我仍然清晰地记得他的模样，脖子上系着一块白毛巾，头上戴一顶蓝布帽子，脸上的神情有点惶惶然，又有一种松了口气的感觉。我爸爸还在北京首都剧场看过传达室，被来中国访问的日本人发现了，说中国的莎士比亚在看传达室，结果就把他弄到胡同深处的北京人艺宿舍去看传达室了。他被造反派表扬，因为他在食堂里每顿都只吃四分钱的菜。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我外婆吃白薯，把皮剥掉，他觉得是浪费，自己把白薯皮吃下去。

我了解我爸爸，他不是一个斗士，也不是思想家，恰恰相反，他是一个很容易怀疑自己否定自己的人，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的生命是一种半感官半理智的形态，始终被美好和自由的情感所吸引鼓动。但他的情感和思想又都是充满矛盾的，而且都加倍地放大了。文化大革命，美好的东西被彻底打碎，所有的路都被堵死，绝望和恐惧把他压垮。而这种可怕的影响再也没有离开他的生活。

我爸爸给我讲过他得知粉碎“四人帮”消息的情形。那时我妈妈已经在1974年去世，他和我妹妹住在一起，他天天吃很多安眠药，和废人一样。他说：“小欢子从外面回家来，走到我床前，两眼发光，对我说，爸！咱们得救啦！我不信，不敢信。怕，怕不是真的，还怕很多。我跑到大街上，那会儿已经是夜里了，我走呀走呀，看到多少家的窗口里亮着灯光，整座楼都是亮的，我忽然感到难以支持，靠在一棵树上。我觉得自己的心脏的承受力已经到了极限。老天爷啊！没有经历过的人不可能明白，那种深重的绝望把人箍得有多么紧！我想我是从大地狱里逃出来啦！”

粉碎“四人帮”后，我爸爸的社会活动渐渐多起来，头衔也越来越多，他的时间几乎被各种各样的活动填满。每次活动回来，他一阵风似的从门外进来，脚步匆匆，进屋后把衣服一脱就倒在沙发上。他总是十分疲倦，人好像被抽空了似的，有一股说不出的沮丧。他心里很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有一次他和我谈，我是用社会活

动麻醉自己,我想写,写不出,痛苦,就用社会工作来充塞时间。他感叹道:这么下去怎么得了?!

我爸爸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多少年来睡眠必须靠安眠药维持,吃过安眠药之后,往往是他精神上最放松的时刻,他的种种潜在的意识就会变成话语。他讲述他的生活经历,他所见过的事,反复地说他要写,要写真实的人。他说:“我痛苦,我太不快乐了,我老觉得我现在被包围着,我要说心里话,说世界上任何人都不敢说的话。”——“我呀,在这个世界上白白过了一辈子,但我有一个最大的所得,我悟啊!人哪,是个丑恶的东西,可是也不,人又那么地吸引你……”他什么都讲,毫无顾虑,他总是为自己一生中所犯的各种错误,失当的行为反复思虑、后悔。有时候他拉着我的手,“小方子,你逼我吧,不逼不行啊!我要写东西,非写不可!”他的嘴用力抿紧,目光闪亮,“我要做一个新人,忘掉过去的荒诞和疑虑,我要沉默,我要往生活的深处钻,放弃这个‘嘴’的生活,用脚踩出我的生活,用手写真实的人生。”他的话像文章一样,思路畅通之极。

有一天夜晚我已经要睡了,听到他大声叫我:小方子!小方子!我跑过去推开他的屋门,看见他躺在床上,大睁着眼睛。他知道我来了,可是并不看我,直视着屋顶,说:“我不成了,又来那个劲了,吃了安眠药也不成,你要不来我就跳下去了。我什么也不想,只想从窗子里跳下去。”他说得迷迷糊糊,他的身体也软绵绵的。我是说他根本不可能跳下去,他已经快要进入睡眠状态了。但我相信,他的灵魂刚才是站在窗台上的,感受着外面巨大的黑夜和冰冷的空气。他喘着粗气,说:“我痛苦,我要写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干!”我说:“那你就写呀!”大约是我的话来得太快,说得太轻巧,他大出一口气,翻过身去。一会儿,我听见他喉咙里发出鼾声,就站起身走到门口,忽然又听见他的声音:“我就是惭愧呀,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真的,我真想一死了事。我越读托尔斯泰越难受……”他的枕边放着托尔斯泰的评传,是他崇拜的作家,“托尔斯泰,”他说,“他一辈子要弄清为什么,他几十年痛苦,他想像农民一样生活,一天走三四个小时,然后写作,大吃,能吃极了,八十二岁还要吃一大碗生菜,他每天又快乐又痛苦,真是一个伟大的人!”第二天早上他对我说:跳楼,只是那么一想,你不要说出去啊。

有的上午他坐在沙发上看报,看着看着睡着了。电话铃一响把他闹醒,电话总是要他开会、题字、看戏、评奖之类的事儿。他一接电话就清醒了,人也精神了,什

么事都应承下来。有一段时间他几乎天天有活动,有时一天有四个日程,日历本儿上记得满满的。然而千真万确,我看到一种痛苦持续不断地困扰着他。这痛苦不像“文革”时期的恐惧那样咄咄逼人,人人不可幸免。这痛苦是只属于他自己的。我曾经反复琢磨这份痛苦的含义,我猜想:痛苦大约像是一把钥匙,唯有这把钥匙能打开他的心灵之门。他知道这一点,他感到放心,甚至感到某种欣慰。然而他并不去打开那扇门,他只是经常地抚摸着这把钥匙,感受钥匙在手中的那份沉甸甸冷冰冰的分量。真正的他则永远被锁在门的里面。

在我爸爸去世后,我整理了他给我和我妹妹写的信,一大部分的信是他八一年到八三年间从上海写给我们的。那时他准备把解放前写了两幕的未完成的剧本《桥》写出来,他的信几乎都在说写作。他写道:“这几年,我要追回已逝的时间,再写点东西,不然我情愿不活下去。爸爸仅靠年轻时写了一点东西维持精神上的生活,实在不行。”他又写:“爸爸最近才悟到,没有一定的工作方向,随遇而安,浪费青春和中年时光,这是最可怜的,想起来甚至觉得惨痛。只有在暮年猛追一阵,补上已逝的时间。但创作真是极艰苦的劳作,时常费日日夜夜的时间写的那一点东西,一遇到走不通想不通的关,又得返工重写。一部稿子不知要改多少遍,现在爸爸连一个草稿,不,一个真正的大纲都没有搞成。当然真有一个结实的大纲与思想,写下去只是费时间,倒不会气馁。”

那一阵子,他找人谈话,搜寻材料。他说:“我现在为了自己最后的创作下了大决心,坚决搞下去,只有乘这股热气、这点灵气写下去。我多年没有这种感觉,没有这种创作的欲望了,难得能写,想写,这对我来说是一刻千金的时候。”在这段话之后他加了括号,括号里写着,“我也许搞不出来,但这个戏的大纲必须趁这段时间弄出来,因此北京人艺三十周年、全国文联开会都不能参加。这个创作不能放下,我知道一放下就完了,而完了,我最后的机会也就完了,我的生命也就等于不存在了。”1981年11月29日的信里,他写道:“最近我十分认识一切事情要办好,无论是求学与写作,都需要愉快的心情。不要以为心情本来就坏,怎么就会好起来?我的经验是愉快的心情可以由自己争取得到的。大约必须钻进工作或学问中去,万不可怕苦。要苦干,干就会从中得到兴味,对学问的爱好,对工作的感情。爱因斯坦说:热爱是最好的老师。他说自己一生的成就便从这句话得益最多。我要加一句:着迷是最好的朋友。”1983年初,他在信中写:“我正在写作,每日夜二时或三时四